

DOI:10.13718/j.cnki.xdsk.2017.05.017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明代文化以其独特的“活力”与“多样性”而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即以书籍出版为例,除了商业化出版物成为大宗之外,实用类的书籍也开始大量涌现,甚至尚有诸多不入正统学者之眼的杂书出版。此即明朝人所谓的出版物“猥滥”。在这些实用类出版物中,边疆史地书、兵书乃至农书的大量出现,最为引人关注。所有这些出版物的出现,无不与当时的时代思潮,即以“实用”“经济”“救荒”为主旨的“实学”思潮桴鼓相应。尤堪注意者,书籍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创造者的构成也开始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倾向,除了传统的文人学士之外,下层知识人更是成为这些文化产品的主要创造者,甚至尚有不少宗室成员参与其中。本期所收两篇论文,张明富所撰之文,通过对明代宗室成员修建教育文化设施的考论,藉此说明宗室成员人生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倾向;葛小寒之文,通过对明代农书的系统考察,说明明代农书具有日用技术性、士人休闲性与事功教化性三大特点,而且农书观同样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倾向。两文所论,大抵可以为明代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下一注脚。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考论

张明富

(1.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市 408100; 2.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市 400715)

摘要:宗室在明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满足和适应其文化教育的需要,明政府注重对宗室的文化教育。明代宗室所建的文化教育设施不仅仅专为宗室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使用,而且惠及儒士、王府护卫子弟及贫民。通过考察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可剖析明代宗室群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取向,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政府对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

关键词:明代;宗室;文化素质;藩禁;儒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7)05-0149-13

文化教育设施是指人们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空间场所。这是一个现代概念,在明代文献中并无此表述。但稽诸史籍,有关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记载并不乏见,将这些史料汇集起来,予以诠释,对全面认识明代宗室群体的整体面貌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通过考察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可剖析明代宗室群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取向,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政府对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然目前学术界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成果面世,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教育设施的种类和数量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记载,多散见于明代《实录》。其他史籍如张廷玉《明史》、焦竑《国朝献征录》等只有零星涉及。兹据爬梳史料所得制成《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事例表》以示(见表1)。

收稿日期:2017-03-20

作者简介:张明富,长江师范学院,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商人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14ZDB035),项目负责人:张明富;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特支计划。

表 1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事例表

序号	修建文化教育基础设施事例	资料出处
1	宁王权,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深自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著书其间。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十六
2	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垺,成化七年封。弘治二年,营御书楼、玩易洞。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
3	唐王弥锦,弘治二年嗣爵,广置精庐于国中,集学徒俊秀者资给之,使肄业。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
4	代府镇国将军仕城奏:“臣于居第建书室一所,奉度御赐经籍,燕处其中,讲求义理,乞赐名额以为箴儆。”上曰:“自古贤人君子,未有不学而能成者,仕垺生长富贵,舍耳目娱玩,而留意经籍,志向可嘉,特赐名曰‘务学’,以勸其成。”	《孝宗实录》卷 100,弘治八年七月癸卯
5	辽府湘阴王豪瓌建书堂,以皮所赐书,因奏乞堂名,上赐额曰“谦勤”。	《孝宗实录》卷 132,弘治十年十二月癸未
6	秦简王诚泳,尝铭其冠服以自警,尤勤问学,雅好吟咏,时节每延致士大夫命酒赋诗,脱略势分,撤鹰房以创侍从儒臣之馆,捐隙地以益正学书院之基。又于府西建小学,校尉子弟之俊秀者以文臣教之。	《孝宗实录》卷 138,弘治十一年六月庚辰;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宗室·秦王传》;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传》
7	襄王佑材建楼藏御史经籍,以楼额为请,命赐名曰“宝文”。	《孝宗实录》卷 189,弘治十五年七月己卯
8	辽府光泽王宠怀奏,自构藏书之堂,用藏颁赐《圣学心法》等书,请赐名扁,诏赐名“博文”。	《孝宗实录》卷 204,弘治十六年十月乙卯
9	赐晋王知烺书院额曰:“养德”,仍赐以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从王请也。	《孝宗实录》卷 208,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子
10	赐沈府沁水王长子勋濂书院额曰“逊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 213,弘治十七年六月辛酉
11	赐晋府庆成王奇渎书院额曰“尚贤”,并赐五经大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 215,弘治十七年八月癸亥
12	赐沈府西阳王子勋泚书院名“勉学”,从沈王奏也。	《武宗实录》卷 1,弘治十八年五月甲辰
13	赐沈府西阳王詮钰书斋名“好古”,从沈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 4,弘治十八年八月己卯
14	唐王即蔬圃立书院,以教其府中军校子弟,请赐额,从之,院名“养正”。	《武宗实录》卷 5,弘治十八年九月癸巳
15	赐韩府襄陵王所建书楼名“荣恩”,从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 5,弘治十八年九月戊申
16	赐西河王书院额为“勉学”,颁《孝慈录》《孝顺事实》二书,从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 13,正德元年五月丙戌
17	赐隰川王聪羨所建书院为“崇礼”。	《武宗实录》卷 13,正德元年五月丁酉
18	西河王奇溯奏乞书籍、书楼额,并请赐敕。诏以《为善阴鹭》、《四书集注》与之,余不许。	《武宗实录》卷 15,正德元年秋七月甲申
19	赐灵川王书院额名“养性”。	《武宗实录》卷 16,正德元年八月壬子
20	赐怀仁王聪淑书院名为“遵道”。	《武宗实录》卷 22,正德二年闰正月壬申
21	赐山阴王成整书院名为“进德”。	《武宗实录》卷 23,正德二年二月乙未
22	宁王宸濠“尝捐百金助修白鹿书院”。	《武宗实录》卷 33,正德二年十二月壬午
23	赐楚王书院额曰“正心”,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41,正德三年八月庚辰
24	秦定王惟焯,正德四年封。关中故无史记,王求善本刊之成趣轩中,俾学士家便观焉。…侍卫子弟,遴其俊秀者,乃设学陶育之。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
25	赐韩王书舍扁曰“崇文”,从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 85,正德七年三月辛亥
26	赐衡阳王书堂名“遵教”,以辽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 130,正德十年十月甲寅
27	赐宁王宸濠书院名“阳春”,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136,正德十一年夏四月丙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七《宸濠之叛》
28	赐永和王知燠书院名曰“乐善”,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 25,嘉靖二年四月戊戌
29	赐宣宁王府奉国将军听深、聪渣、聪湊《四书大全》各一部,其书楼赐名额曰“勉学”,皆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38,嘉靖三年四月甲寅
30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勋沅书院,赐名“养德”,仍敕其造作当于府中,不得侵占民地。	《世宗实录》卷 46,嘉靖三年十二月乙巳
31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成燭书楼,赐名“博观”,仍敕其造作当于府中,不得侵占民地。	《世宗实录》卷 46,嘉靖三年十二月乙巳
32	赐鲁府东阬王当泚书堂名“励志”,仍给《性理大全》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57,嘉靖四年十一月戊辰
33	唐王宇温构书堂请额名赐名“居善”。	《世宗实录》卷 232,嘉靖十八年十二月丙戌
34	赐汝王祐楫楼名“崇本”,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 74,嘉靖六年三月辛巳
35	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藻、聪湏、聪涎建楼、堂以藏御书,请名额,诏名其楼曰“处善”,堂曰“孝义”。	《世宗实录》卷 76,嘉靖六年五月乙巳
36	赐鲁府辅国将军当濡书院额曰“养正”,仍给《四书性理大全》《通鉴节要纲目》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85,嘉靖七年二月庚戌

37	赐鲁藩巨野王府镇国中尉观熿书院额名“承训”。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十六
38	赐荣王佑柝所建书楼名“崇义”，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 91，嘉靖七年八月癸亥
39	赐楚王荣浹书院名额“崇本”，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 105，嘉靖八年九月己亥
40	赐晋王新埏书院额名“宝善”，给四书五经大全、少微通鉴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240，嘉靖十九年八月丙寅
41	赐宁河王奇法书院额名“明教”，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382，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壬戌
42	蜀成王让栩创义学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
43	赐楚王英烜敕，约束宗室，仍赐书院名曰“纯心”，以《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赐之，俱从所请也。	《世宗实录》卷 386，嘉靖三十一年六月戊辰
44	赐淮王厚寿书楼名曰“赏赐”。	《世宗实录》卷 429，嘉靖三十四年闰十一月甲申
45	赐交城王表佃书院额名“好礼”，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460，嘉靖三十七六月辛丑
46	赐沈王恬爇书学堂额曰“修业”。	《世宗实录》卷 477，嘉靖三十八年十月甲子
47	江西瑞昌王府镇国中尉多炫、多搏各捐禄米银买田五百余亩，输之南昌学宫；又创书院一所，以待士之无居食者。	《世宗实录》卷 489，嘉靖三十九年十月辛亥
48	赐岷王定耀书院额名“乐善”，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536，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壬寅
49	赐赵府管理府事成臬王载琰书院额名“遵道”，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552，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己亥
50	赐吉王翊镇书院额曰“崇德”，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558，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己亥
51	赐广济王定燧书院名“遵训”，从王请也。	《穆宗实录》卷 36，隆庆三年八癸亥
52	韩王朗铤以御赐书籍建楼藏之，疏请楼额名，赐名“宝籍”。	《穆宗实录》卷 42，隆庆四年二月乙丑
53	赐名郑王厚烷藏奉御书之楼曰“尊训”，从其请也。	《穆宗实录》卷 60，隆庆五年八月甲寅
54	赐西河王表相楼曰“崇训”，从其请也。	《穆宗实录》卷 64，隆庆五年十二月甲午
55	赐华阳王承燭书院名“乐善”。	《神宗实录》卷 15，万历元年七月丁酉
56	赐阳夏王载莪书楼额名“遵训”。	《神宗实录》卷 33，万历二年闰十二月乙亥
57	肃王缙燮奏，本府城内有隙地一区，欲建阁尊藏宸翰外，有书楼一所，请赐额名及祖训、会典、经书子史诸书·部覆命与四书五经各一部，阁名“遵训”。	《神宗实录》卷 62，万历五年五月丙申
58	赐德平王载堞楼额“传文”，从其奏请。盖造楼一座，供奉诏敕及盛积古今书典也。	《神宗实录》卷 32，万历二年十二月丙辰
59	赐山阴王俊柵书院额名“乐善”，仍给与经书，从王请也。	《神宗实录》卷 108，万历九年正月乙亥
60	赐高堂王厚煊书院额名“思训”，从其请也。	《神宗实录》卷 115，万历九年八月甲午
61	赐商河王载堦书楼额名“勉学”，从其请也。	《神宗实录》卷 115，万历九年八月甲午
62	赐乐安王多熿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书院名为“博文”，从乐安王所请也。	《神宗实录》卷 144，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壬申
63	赐益王翊钊书院额曰“逊学”，仍给四书五经一部。	《神宗实录》卷 147，万历十二年三月戊寅朔
64	岷王定耀忠孝性成，恭俭夙著，捐己禄以赈乏，置学田以崇儒。	《神宗实录》卷 164，万历十三年八月庚申
65	赐郑王厚烷书院名额曰“景贤”。	《神宗实录》卷 185，万历十五年四月辛未
66	上蔡王载堦奏讨书籍并书院名额，准给四书五经夜集注一部，书院名“学文”。	《神宗实录》卷 278，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庚子
67	孟津王载堦奏讨四书五经集注并皇明祖训、为善阴鹭、孝行等书并书院名额，诏准给之，额名“勉学”。	《神宗实录》卷 285，万历二十三年五月甲午
68	赐晋王敏淳四书五经各一部，赐书院额名“宝善”，上嘉其好学，故得请。	《神宗实录》卷 286，万历二十三年六月癸亥
69	赐东垣府翊铠书院额名“循理”。	《神宗实录》卷 333，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丁丑
70	鲁王寿鎰捐银一千五百余两，修建学宫。	《神宗实录》卷 340，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壬辰
71	赐乐昌王廷儒书院、书楼额名“弘训”。	《神宗实录》卷 351，万历二十八年九月丙寅
72	赐繁昌王厚燦书院额名“味道”。	《神宗实录》卷 370，万历三十年三月丁丑
73	赐庐江王厚光书院名“循理”。	《神宗实录》卷 382，万历三十一年三月丙戌
74	赐建德王翊铤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所建书院额名“守文”。	《神宗实录》卷 400，万历三十二年九月己酉
75	赐楚王叶奎书院额名“崇德”。	《神宗实录》卷 448，万历三十六年七月癸卯
76	赐惠府坊额名曰“夹辅亲藩”，书楼名曰“博文”。	《熹宗实录》卷 81，天启七年二月丁未

从表 1 所列事例可以看出，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教育设施范围较广，包括书斋、书舍、书室、书楼、书堂、书院、学宫、义学、小学等。修建方式有自建、有助修。绝大部分为宗室自建，即由宗室全额出资；助修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且主要是地方的书院和学宫。所建文化教育设施也不仅仅专为宗室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使用，而且惠及儒士、王府护卫子弟及贫民。这些文化教育设施，根据其功能，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1. 文化设施。文化设施主要包括书室、书斋、书舍、书楼、书阁。其功用大体一致,主要供宗室藏书、研修之用,但也存在微小的差别。一般而言,书楼的规模较书斋、书舍、书室、书阁大,书室、书舍、书斋、书阁规模较小;在功能上,书斋、书舍与书楼、书室、书阁也有区别,书斋、书舍,也可称书房,主要为读书、著述的地方,藏书只是其附带的功能;书楼、书室、书阁则主要为藏书之地,但也可成为研修之所。除此,还有专为侍从儒臣修建的侍从儒臣之馆,如秦简王诚泳撤鹰房以创侍从儒臣之馆,供其从事文化活动使用。另外,还应包括宁王权构置的精庐及唐府三城康穆王堽营建的玩易洞。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设施以书楼为大宗,书楼 19 座、书室 1 所、书舍 1 个、书斋 1 个、书阁 1 个、侍从儒臣之馆 1 个,玩易洞 1 个,精庐 1,共建文化设施在 26 个。其中,亲王建造 12 个,郡王建造 10 个,将军建造 4 个,亲王、郡王为建造的主力;从建造时间上划分,永乐 1 个,弘治 7 个,正德 2 个,嘉靖 6 个,隆庆 3 个,万历 6 个,天启 1 个,弘治、嘉靖、万历三朝所建约占总数的 61%(见表 2)。

表 2 明宗室修建文化设施统计表

时间	宗室	文化设施名称	数量
永乐间	宁王权	精庐	1
弘治八年	代府镇国将军	书室	1
弘治十一年	秦王	侍从儒臣之馆	1
弘治十五年	襄王	书楼	1
弘治十八年	沈府西阳王	书斋	1
弘治十八年	韩府襄陵王	书楼	1
弘治间	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堽	书楼	1
弘治间	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堽	玩易洞	1
正德元年	西河王	书楼	1
正德七年	韩王	书舍	1
嘉靖三年	宣宁王府奉国将军	书楼	1
嘉靖三年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	书楼	1
嘉靖六年	汝王	书楼	1
嘉靖六年	隰川王府奉国将军	书楼	1
嘉靖七年	荣王	书楼	1
嘉靖三十四年	淮王	书楼	1
隆庆四年	韩王	书楼	1
隆庆五年	郑王	书楼	1
隆庆五年	西河王	书楼	1
万历二年	阳夏王	书楼	1
万历二年	德平王	书楼	1
万历五年	肃王	书楼	1
万历五年	肃王	书阁	1
万历九年	商河王	书楼	1
万历二十八年	乐昌王	书楼	1
天启七年	惠府	书楼	1

2. 教育设施。明代宗室修建的教育设施主要有书院、学宫、义学和学田等。书院是古代的教育机构,主要功能是授徒讲学,发展教育事业。宋明时期,书院较多,是我国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宗室建立的书院数量也不小,据表 1 所载即达 41 所,建造者有亲王 13 人,郡王 25 人,镇国将军 1 人,辅国将军 1 人,镇国中尉 1 人,且集中建造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时期。其中,弘治 5 所,正德 7 所,嘉靖 13 所,隆庆 1 所,万历 15 所(见表 3)。

另外,尚有宗室献地、捐金,支持当地的书院建设。陕西西安有鲁斋书院,名闻关中,年久荒废。弘治九年(1496)陕西提学杨一清欲复其旧观,然故址已半为民居。秦王诚泳闻之,即慷慨“捐隙地一区”以建正学书院,支持书院办学,书院落成,亲自撰文以记其事^[1]卷一《宗室·秦王传》。白鹿书院,即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南宋朱熹、陆九渊等曾在此讲学、辩论,为理学传播的中心,也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元末毁于战火,明正统以后多次维修,宁王宸濠亦曾捐献百金助修白鹿书院^[2]卷33,正德二年十二月壬午。

表3 明代宗室修建书院统计表

时间	宗室	数量
弘治十七年	晋王	1
弘治十七年	沈府沁水王长子	1
弘治十七年	晋府庆成王	1
弘治十八年	沈府西阳王子	1
弘治十八年	唐王	1
正德元年	西河王	1
正德元年	隰川王	1
正德元年	灵川王	1
正德二年	怀仁王	1
正德二年	山阴王	1
正德三年	楚王	1
正德十一年	宁王	1
嘉靖二年	永和王	1
嘉靖三年	永年王	1
嘉靖七年	鲁府辅国将军	1
嘉靖间	鲁府巨野王府镇国中尉观熈	1
嘉靖八年	楚王	1
嘉靖十九年	晋王	1
嘉靖三十一年	宁河王	1
嘉靖三十一年	楚王	1
嘉靖三十七年	交城王	1
嘉靖三十九年	瑞昌王府镇国将军	1
嘉靖四十三年	岷王	1
嘉靖四十四年	赵府管理府事成皋王	1
嘉靖四十五年	吉王	1
隆庆三年	广济王	1
万历元年	华阳王	1
万历九年	山阴王	1
万历九年	高堂王	1
万历十一年	乐安王	1
万历十二年	益王	1
万历十五年	郑王	1
万历二十二年	上蔡王	1
万历二十三年	孟津王	1
万历二十三年	晋王	1
万历二十七年	东垣王	1
万历二十八年	乐昌王	1
万历三十年	繁昌王	1
万三十一年	庐江王	1
万历三十二年	建德王	1
万历三十六年	楚王	1

学田,即书院及府州县学所属的田地,其收入为学校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专资建学及赡恤贫士”^[3],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将其列入教育设施的范围。学宫,即府州县官办的学校;义学,即为贫寒子弟设立的蒙学,延师教读,免费上学;小学,专为王府护卫子弟而设。明宗室捐禄置办学田、修建学宫、义学、小学共有5例:瑞昌王府镇国中尉多炫、多熈买田500余亩捐献给南昌学宫,以为学田^[4]卷489,嘉靖三十九年十月辛亥;岷王捐禄置学田以崇儒学^[5]卷164,万历十三年八月庚申;鲁王寿鏞捐银1500余两修建学宫^[5]卷340,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壬辰;蜀成王让栩创设义学^[1]卷一《宗室一·蜀王传》;秦简王诚泳于王府之西建立小学,让军校子弟中的俊秀者入学,命王府文官任教,有时甚至亲自“课试”,对有潜力者,送其参加府州县学选拔考试,进入地方儒学学习,开王府护卫子弟教育之先河^[6]卷138,弘治十一年六月庚辰^[1]。宁王权的精庐是其个人著述、鼓琴的地方,唐王弥筛广置于“国中”的精庐与之不同,是资助俊秀士子完成学业的场所——学校^[7]卷二《宗室二·唐王传》,应属教育设施。

3. 兼具文化、教育功能的书堂。见诸记载,明代宗室修建的书堂数量不是太多,从《明实录》的

记载中仅搜集到 7 所(见表 4)。虽皆名为书堂,但功能不尽相同:有的专为宗室藏书而建,是宗室的藏书之堂^[6]卷 204,弘治十六年十月乙卯,为文化设施;有的则是藩王讲读的地方,属教育设施。如马文升针对明中后期宗室存在的弊端,建议王府辅导官员要每日请王于书堂内讲读经史^[7]卷六十二《马端肃公奏疏·题为选辅导预防闲以保全宗室疏》;另如益庄王厚焯“每五日一诣书堂,命儒臣进讲陈进道及治乱兴衰之故”^[1]卷二《益庄王神道碑铭》。从表 1 可明确,辽府湘阴王豪燾、辽府光泽王宠怀、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溇、鲁府东瓯王当泚所建书堂为藏书之用。由于记载的简略,衡阳王、唐王宇温、沈王恬烺书堂究竟是藏书之堂,还是讲读之所,已无法分辨清楚,姑俟待考,但明代宗室书堂存在两种功能的分野应是确凿无疑的。

表 4 明代宗室书堂统计表

时间	宗室	数量
弘治十年	辽府湘阴王	1
弘治十六年	辽府光泽王	1
正德十年	辽府衡阳王	1
嘉靖四年	鲁府东瓯王	1
嘉靖六年	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溇等	1
嘉靖十八年	唐王	1
嘉靖三十八年	沈王	1

当然,上述对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教育设施的统计应是不完全的。表 1 所列材料多为宗室为其所建的文化教育设施请求皇帝赐予额名而留下的记载,修建有文化教育设施而未请额名的情况,也应该是存在的。如益庄王每五日一诣书堂,显然是建有书堂的,但并未请名。另外,从有关明代宗室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不少宗室藏书丰富,著述可观,当是有书楼、书室等文化设施的,但未见其记载。不过,史学研究只能依据材料说话,不能臆测,我们只能根据确凿的记载进行统计和分析。

二、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原因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记载虽不完全,但应已囊括绝大部分,涉及的宗室人数已经不少,且遍及亲王、郡王、将军、中尉各个爵级,这代表了明代宗室行为的另一种集体趋向,即在明代宗室群体的一片征歌逐乐、好利渔色的喧嚣之中,欣赏到了宗室对文化教育事业执着追求的唯美的历史图景。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修建这些文化教育设施呢?他们的这一行为是哪些因素促成的呢?史籍记载较为简略,我们仅做一尝试性的分析。

第一,明政府允许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为其行为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这方面明确的记载不多,我们只找到了一条材料,见于《明会典》和《礼部志稿》:宗室“盖造书院,止令自备工料,不得因而干涉有司,烦扰百姓,违者许抚按官参治。”^[8]卷五十七《王国礼三·书院》这一法令议定于嘉靖年四十三年,体现了明代的国家意志,明令宗室修建书院必须自备工料,自己出资,不得滋扰地方官府,累及百姓,否则,抚按官将予参劾治罪。认真体会这段材料,明政府是允许宗室修建书院的,只是此前宗室在修建书院的过程中有向地方官府及百姓索要“工料”的情况发生,故做此严厉规定。但这一规定的出台,既是对以前宗室修建书院事实的承认,更为宗室修建书院提供了制度的保障,确立了合法性的依据,对宗室修建书院无疑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对于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政府虽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也是许可的,这从皇帝对宗室修建书楼、书室、书堂等文化设施的赐名就可以看出。

第二,明代宗室待遇优渥,具备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经济条件和能力。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没有经济的支撑是无法办到的。那么,明宗室是否具备这种经济能力呢?明制,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 10 岁,立为亲王世子。诸子年 10 岁封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诸子封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封镇国中尉,镇国中尉之子封辅国中尉,辅国中尉之子及孙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长也请婚”,不授职,不任事,“禄之终身”^[9]卷一百十六《诸王传》。亲王岁禄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

军千石,辅国将军 800 石,奉国将军 600 石,镇国中尉 400 石,辅国中尉 300 石,爵级最低的奉国中尉亦有 200 石^[9]卷八十二《食货六》。除常禄外,亲王还有赐田、课税赐予及不定期的丰厚赏赐等,待遇优厚。这方面已多有论说,且为人所熟知,故不细述。可见,明代宗室、特别是亲王、郡王,是具备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经济能力的。这也和上述的统计中,亲王、郡王是明宗室中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主力的结论相印证。

第三,皮藏御赐书籍及“古今图书”、供奉诏敕、尊藏宸翰,是明宗室修建书室、书楼、书堂等文化设施的直接动因。这方面的记载见于表 1 的就有 9 条。表 1 第 1 条载:代府镇国将军仕垓“于居第建书室一所,奉皮御赐经籍,燕处其中,讲求义理”;第 2 条载:辽府湘阴王豪壘建书堂“以皮所赐书”;第 4 条载:襄王佑材“建楼藏御赐经籍”;第 5 条载:辽府光泽王宠怀“自构藏书之堂,用藏颁赐《圣学心法》等书”;第 31 条: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濂、聪渥、聪涎“建楼、堂以藏御书”;第 48 条:韩王朗铈“以御赐书籍建楼藏之”;第 49 条:郑王厚烷建楼“藏奉御书”;第 53 条:肃王缙燝于本府城内隙地“建阁尊藏宸翰”;第 54 条:德平王载堦“盖造楼一座,供奉诏敕及盛积古今书典”。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呢?考诸《明实录》,应明代宗室的请求,朝廷确实颁赐给了宗室大量的书籍(见表 5)。

据表 5 统计,在永乐元年(1403)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 216 年中,请求赐予书籍的宗室共 98 人次,赐予书籍的数量也不小,且种类繁多,涵盖经史子集各个部类。赐书频次最高的书籍为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及倡导践履儒家伦理的著作《孝顺事实》《为善阴鹭》;其次为记载王朝兴衰的通鉴类历史著作;再次为祖训、典礼、音韵类著作,其他赐书的频次皆在 4 次以下。如《四书》《四书大全》《四书集注》《四书白文》等以“四书”为书名的书籍 51 次,《孝顺事实》25 次,《为善阴鹭》22 次,《五经》《五经集注》《五经大全》等以“五经”为书名的书籍 12 次,《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以“通鉴”为书名的书籍 10 次,《尚书》《书经集注》《书经集传》等“尚书”类书籍 7 次,《贞观政要》3 次,《新编五伦书》、《五伦书》等书名中有“五伦”的书籍 3 次,《国朝礼制集要》1 次,《皇明典礼》4 次,《明伦大典》1 次,《自警编》1 次,《文选》1 次,《史记》1 次,《两汉诏令》1 次,《洪武正韵》6 次,《玉篇》2 次,《广韵》3 次,《诗传》《诗》等“诗经”类书籍 5 次,《劝善书》3 次,烈女传 1 次,《圣学心法》4 次,唐李白诗 1 次,《五音集韵》1 次,《饮膳正要》1 次,《对类》2 次,《御制对类》1 次,《孝经》1 次,《千字文》《百家姓》《小学》1 次,《礼记》1 次,《易》、《易经》、《易经注》、《易经大全》等“易类”书籍 4 次,《大明官制》2 次,《大明仁孝皇后内训》3 次,《性理大全》《性理群书》等性理类书籍 4 次,《皇明祖训》7 次,《大学衍义》2 次,《御制文集》2 次,《历代名臣奏议》1 次,《祖训条章》1 次,《孝慈录》1 次,释道二家诸藏 1 次,《洪武礼制》1 次,《皇明内令》1 次,《唐三体诗》1 次,《诸司职掌》1 次,《历代臣鉴》1 次,《含春堂诗》2 次,《祖德诗》1 次,《敬一箴》2 次,十七史 1 次。请求赐予书籍的王府,既有亲王府,也有郡王府,但以郡王府居多。据初步统计,请赐书籍的亲王府有 19 个,郡王府 43 个。另外,斥资大量购买书籍的宗室也不少,这仅在张廷玉《明史》诸王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宗室传中就有颇多的记载,此处不赘。因此,言明代宗室修建书楼、书堂等文化设施是为了皮藏御赐书籍、盛积古今图书是有根据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明宗室修建小学、书院、学宫,购置学田等教育设施是为了教育军校子弟、救助贫寒士子、尊崇儒学,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诚。如表 1 第 6 条:秦简王诚泳“于府西建立小学,凡军校子弟之秀者,命文臣教之。”第 11 条:唐王立书院“以教其府中军校子弟”,为王府军校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场所。第 43 条载:江西瑞昌王府镇国中尉多炫、多燝“创书院一所,以待士之无居食者”,救济贫困士人。第 60 条:“岷王定耀忠孝性成,恭俭夙着,捐己禄以赈乏,置学田以崇儒。”解决地方儒学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这些史料都表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是他们修建、购置教育设施的内在动力。

表5 明宗室请赐书籍统计表

时间	请求赐书宗室、结果	资料出处
永乐元年二月乙卯	肃王模奏求书籍、药材,赐书报曰:所求书籍,今有者悉送去。惟十七史诸书,俟印装续送。昔洪武中,兄尝奏求乳香,皇考以分封供给有制,不与,贤弟其亮之。	《太宗实录》卷17
成化二十年四月乙巳	初,徽王见沛为子求书籍,又欲遣人往广西等处收买药材。上赐之《孝顺事实》《为善阴鹭》《尚书》《四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书,复书谕王,药材不必收买,凡合用者具奏给之。	《宪宗实录》239
正统十四年六月丙子	书复淮王祁铨曰:“尔奏请颁《新编五伦书》,今特以一部奉去观览,以遂贤弟好古乐善之心。”	《英宗实录》卷179
景泰二年十月己巳	赐鲁王肇辉《孝顺事实》等书十三部、褒城王范堦《五伦书》一部,从其请也。	《英宗实录》卷209
天顺元年五月辛未	交城王堦堦奏求《国朝礼制集要》《自警编》《文选》《史记》《两汉诏令》,上命给之。	《英宗实录》卷278
成化九年八月乙酉	赐岷府南渭王音戴《四书大全》《洪武正韵》等书,从其请也。	《宪宗实录》卷119
成化二十一年六月癸巳	赐蜀王申普《四书五经大全》《续资治通鉴纲目》,从所请也。	《宪宗实录》卷267
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庚辰	赐辽府湘阴王豪璠《续资治通鉴纲目》《玉篇》《广韵》诸书,从其请也。	《宪宗实录》卷291
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己丑	赐辽府枝江王恩钱《四书大全》,从其请也。	《宪宗实录》卷291
弘治元年二月丁巳	赐沈府稷山王詮塗《诗传》、代府镇国将军仕堡《四书大全》《劝善书》《列女传》,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1
弘治元年三月丙戌	赐秦府永寿王诚淋《五经》《四书》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2
弘治元年九月癸酉	徽王见沛以二子俱出阁就外傅,请书籍于朝。上赐书答之:“叔父生身富贵,能以是为教,诒谋远矣。今以《四书大全》《四书集注》《四书白文》《圣学心法》《贞观政要》《劝善书》《为善阴鹭》《孝顺事实》《唐李白诗》《五音集韵》《洪武正韵》《饮膳正要》《玉篇》《广韵对类》各一部,《孝经》《千字文》《百家姓》《小学》,并复印件各二本附去,至可收用,惟叔父亮之。”	《孝宗实录》卷18
弘治元年九月己卯	赐晋府宁化王钟鏊《书》《诗》《礼记》三经及《洪武正韵》等书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8
弘治元年九月壬午	赐辽王恩籍《诗》《传》《易》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8
弘治二年三月庚辰	赐辽府松滋王《四书集注》《大明官制》《为孝阴隲》《孝顺事实》《劝善书》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4
弘治七年九月戊子	赐秦府永寿王诚淋《通鉴纲目》,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92
弘治八年三月甲辰	赐沈府唐山王勋澄《尚书》《诗传》《四书》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98
弘治八年七乙酉	赐沈府灵川王詮铄《孝顺事实》《为善阴鹭》,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02
弘治八年十月辛酉	赐沈府宜山王詮鏞《孝顺事实》《为善阴鹭》,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05
弘治八年十一月己亥	赐代府溧阳王聪瀚《四书大全》《为善阴鹭》二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06
弘治八年十二月己未	赐吉阳王聪注《为善阴鹭》《洪武正韵》《四书大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07
弘治九年三月辛巳	赐秦府永兴王诚澜《通鉴纲目》,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10
弘治九年十一月丙寅	赐辽府长垣王恩钾《大明仁孝皇后内训》及《资治通鉴纲目》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19
弘治十年九月戊辰	赐沈府吴江王詮鏗《为善阴鹭》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29
弘治十年十二月壬辰	赐沈府西阳王铨钲《五伦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32
弘治十二年六月辛卯	赐代府管理府事长子俊杓《五经四书大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51
弘治十年十二月辛卯	徽王见沛奏,宪庙尝赐道释二家诸藏,经今损坏错乱,更乞颁赐,不允。	《孝宗实录》卷132
弘治十三年十二月癸巳	赐韩府西德王偕灏《四书大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38
弘治十四年五月辛亥	赐徽王见沛《四书集注》等书,从王请也。	《孝宗实录》卷174
弘治十四年十月庚戌	赐秦府沂阳王之子秉奏《为善阴鹭》《孝顺事实》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80
弘治十五年三月甲申	赐襄王祁鏞《为善阴鹭》《孝顺事实》《性理大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85
弘治十七年四月壬戌	赐沈府唐山王勋澄《为善阴鹭》《四书集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1
弘治十七年五月辛亥	赐沈府沁水王长子勋瀚《为善阴鹭》《孝顺事实》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2
弘治十七年八月甲戌	赐沈府西阳王铨钲《孝顺事实》《四书集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5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丁卯	赐沈府唐山王勋澄《易经》《四书集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9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子	赐晋王知焯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从王请也。	《孝宗实录》卷208
弘治十七年八月癸亥	赐晋府庆成王奇演五经大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5
弘治十八年三月己酉	赐沈府宿迁王詮鏞、辽山王铨钲《孝顺事实》《四书集注》《为善阴鹭》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22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甲辰	诏赐山阴王长子成鏊《孝顺事实》《为善阴鹭》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7
正德元年五月丙戌	赐西河王《孝慈录》《孝顺事实》二书,从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13
正德元年六月甲申	西河王奇溯奏乞书籍,并请赐教,诏以《为善阴鹭》《四书集注》与之。	《武宗实录》卷14
正德元年十月戊辰	怀仁王奏请书籍,诏赐《为善阴鹭》《孝顺事实》《洪武正韵》《四书集注》各一部。	《武宗实录》卷18
正德元年十一月壬辰	诏与宜山王詮满《四书集注》《洪武正韵》各一部,从其父沈王奏也。	《武宗实录》卷19

正德二年五月乙卯	赐定陶王詮籀《四书集注》，从沈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 25
正德二年七月庚戌	赐郑府繁昌王《圣学心法》《易经集注》各一部。	《武宗实录》卷 28
正德二年八月辛卯	赐郑府东垣王《四书集注》《圣学心法》各一部。	《武宗实录》卷 30
正德二年十月丙戌	赐郑府庐江王《大学衍义》，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31
正德三年二月戊寅	赐辽府光泽王宠瀛《皇明祖训》《仁孝皇后内训》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35
正德三年二月戊子	赐肃王次子淳化王真泓《孝顺事实》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35
正德三年四月丙申	以《御制文集》《孝顺事实》《四书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诸书赐宁王宸濠。	《武宗实录》卷 37
正德元年五月丁酉	以《皇明祖训》及《皇明典礼》二书赐沈王庶长子铨铎，从所请也。	《武宗实录》卷 13
正德三年八月庚寅	赐蜀府华阳王《仁孝皇后内训》《圣学心法》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41
正德三年十一月庚子	赐襄垣王府镇国将军仕怀《祖训家章》《皇明典礼》《洪武礼制》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44
正德四年四月癸卯	赐沈世子詮铎《皇明内令》《御制对类》《四书集注》各一部，从沈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 48
正德四年三月庚申	赐鲁府辅国将军当潞、当灏《四书集注》《唐三体诗》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48
正德六年五月壬子	赐辽府长垣王恩铎《皇明祖训》《皇明典礼》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75
正德六年五月丙寅	赐肃王孙弼桓《四书大全》《孝顺事实》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75
正德六年八月戊寅	赐南渭荣顺王管府事镇国将军膺钶《皇明祖训》，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78
正德十三年八月庚辰	赐肃王《皇明典礼》《大明官制》《诸司职掌》《洪武正韵》，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 165
嘉靖元年四月乙未	赐灵丘王聪涌《性理大全》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13
嘉靖元年九月丙辰	赐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濂、聪潏、聪澍《四书五经大全》《性理群书》《孝顺事实》各三部，从康肃王嫡长子俊柏请也。	《世宗实录》卷 18
嘉靖元年十月壬辰	靖安王表杖奏乞书籍，诏赐《贞观政要》《四书》《五经》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 19
嘉靖二年正月丁巳	赐巨野王府辅国将军当瀆《四书集注》《孝顺革实》《为善阴鹭》各一部，从所请也。	《世宗实录》卷 22
嘉靖二年四月癸巳	隰川王俊桓奏请《高皇帝御制文集》《仁孝文皇后内训》及《四书五经大全》《纲目通鉴》诸书，上命赐诗传一部。	《世宗实录》卷 25
嘉靖二年闰四月辛亥	鲁王为镇国将军健樞奏求书籍，诏以四书大全给之。	《世宗实录》卷 26
嘉靖二年六月戊申	岷王彦汰奏求书籍，赐《皇明祖训》《五经四书》《通鉴纲目》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 28
嘉靖二年六月乙丑	赐郑府庐江王见浦尚书一部。	《世宗实录》卷 28
嘉靖二年八月乙未	赐庆成王奇湏《御制文集》《历代巨鉴》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30
嘉靖三年二月丙辰	隰川王俊柏疏乞书籍，诏与《四书大全》《孝顺事实》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 36
嘉靖三年四月甲寅	赐宣宁王府奉国将军听濂、聪澄、聪湊《四书大全》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38
嘉靖三年九月丙寅	赐淮王《祖训》一部。	《世宗实录》卷 43
嘉靖三年十二月乙巳	赐永年王府辅国将军勋泓子彻栻等辅国将军成燭子聪泛等《书经集传》《孝顺事实》《为善阴鹭》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 46
嘉靖四年十一月戊辰	赐鲁府东阬王当泚《性理大全》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57
嘉靖五年三月壬子	隰川王府镇国将军仕垣卒，子成钱奏乞辞禄庐墓，并求《孝顺事实》《为善阴鹭》及《五经四书大全》《朱子纲目》各一部，礼部覆奏，宗室庐墓无旧例，有旨：与《孝顺事实》《为善阴鹭》《四书大全》各一部，余不允。	《世宗实录》卷 62
嘉靖五年五月乙丑	赐晋王知烺《四书集注》《玉篇》《广韵》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 64
嘉靖六年三月丙戌	赐韩王旭樞、赵王原煊曰：《四书大全》《为善阴鹭》《孝顺事实》《对类》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74
嘉靖七年二月庚戌	赐鲁府辅国将军当灞《四书性理大全》《通鉴节要纲目》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85
嘉靖八年八月壬午	赐卫辉王弥鏞恩纪《含春堂诗》《敬一箴》《通鉴纲目》，并堂名“师古”，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104
嘉靖九年二月丁卯	赐伊王吁淳《四书》《易经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鹭》各一部，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 110
嘉靖九年四月庚申	赐庆成王奇湏、山阴王成整各《明伦大典》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112
嘉靖九年九月壬寅	赐靖江王邦攀《书经集注》《四书大全》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 117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戊辰	赐楚王英检敕，约束宗室，以《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赐之，俱从所请也。	《世宗实录》卷 386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壬午	赐沈世子理尧《敬一箴》《皇明祖训》《祖德诗》，恩纪《含春堂诗》《四书大全》《大学衍义》各一部，从沈王恬皎请也。	《世宗实录》卷 474
万历五年四月戊辰	赐西河王《四书五经集注》，从王请也。	《神宗实录》卷 61
万历八年正月庚戌	赐山阴王俊柵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	《神宗实录》卷 95
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壬申	赐乐安王多爨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从乐安王所请也。	《神宗实录》卷 144
万历十二年三月戊寅朔	赐益王翊钊四书五经一部。	《神宗实录》卷 147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辛未	赐荆王由樊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等书。	《神宗实录》卷 581

第五，藩禁的影响。所谓“藩禁”，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宗室的限制。其目的就是为了防闲，以解

除宗室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代的“藩禁”正式开启于永乐，最后形成于弘治。内容颇多，法制严密：宗室不得预兵事，出仕之令亦废，并不准习四民之业，王亲不任京职等。不仅权力空间尽失，且出城省墓请而后许，藩王之间的往来更遭禁绝。“贤才不克自见”，身居封城形同幽禁，动辄得咎。“藩禁”对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先看一组统计数据：据表2，明代宗室修建文化设施26个，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四朝修建的即达25个；据表3，明代宗室修建的书院41所，弘治5所，正德7所，嘉靖13所，隆庆1所，万历15所；其他如学宫、义学、小学的修建，学田的购置，也皆在弘治朝及以后。这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对应，不会完全出于偶然，而应是存在历史和逻辑的紧密联系。那么，“藩禁”是如何对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呢？“藩禁”的出现及最后形成，使宗室在洪武朝的风采不再。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劣，促使宗室群体的行为选择出现了多元的取向：有的选择了抗争，如图谋不轨、觊觎大位；有的征歌逐乐、好色渔利，沉溺于糜烂的物质享受之中消耗生命；有的则心情苦闷、压抑，而又不甘坠落，遂谨言慎行，埋首读书、著述，究心文化教育，重新定位人生，以转移人生的方向，寻找人生的意义。后者的事例不少。如，荆府富顺王厚焜，正德九年封，王幼年失怙，稍壮，“乃潜心问学，发愤至废食寝，遂博贯群艺”，“嗜诗，兼精绘事”。尝读刘向《说苑》至“臣欲事而君不用，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觉悲从中来，“辄三复涕下”^[1]卷二《宗室二·荆王传》。这里既有对父亲早逝的伤悼，更有对朝廷抑制宗藩，防闲过峻，不能实现经国之志的无奈和抑郁。周府鄢陵四辅国将军同辖，鄢陵僖王孙，10岁受封，岁禄800石，然不以安享富贵为满足，不愿过声色犬马的生活，认为那是“速灭之道”，不予认同。“好诗书，乐与衣冠徒游。尝读前史，览功名之会，辄抚卷慨然而叹曰：‘嗟，诚使某备一官，更生普鼎，敢多吾哉！’”^[1]卷一《宗室一·周王传》既充满了对博取功名，兼济天下的向往，也透露出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落寞。益庄王，“始藩于益，甫离紫禁，狎熟贵事，厚自贬损，鞠躬厉行，刻意学问”，面对“藩禁”的压力，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遁入读书一途。其子厚焯，“实肖”其父，颖敏而谨慎。正德四年（1509），封益王世子，“日居东府考览六经，搜综百氏，神解妙悟，不烦师程”。嘉靖二十年（1541），袭益王爵，“愈自抑畏，百尔政务恪遵先王之旧”，“于外物无所嗜，顾独嗜学，鸡鸣盘漱，即洒扫庭内，陈经史于几上，危坐讽诵，恒至夜分，虽盛暑不辍。”^[1]卷二《宗室二·益王传》生活模式无异一介寒儒！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能感觉到他们普遍地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被剥夺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哀怨！也能深切地体会到“藩禁”带给他们的心灵的震颤与恐惧！人生的价值在何处？怎样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他们基于对生存环境的认知，做出了读书、著述的行为选择。这一行为选择极大地推动了宗室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宁王权，永乐元年（1403）二月，改封南昌，慑于帝威，“深自韬晦，所居宫庭无丹彩之饰，覆殿瓴甍不请琉璃，构精庐一区，蒔花艺竹，鼓琴著书其间”^[1]卷一《宗室一·宁王传》。秦简王诚泳，弘治元年（1488）袭封，弘治十一年薨。谨守礼法，“声色歌舞、货利田猎澹然无所好”，“自奉俭素，居常布衣蔬食”，“喜读书，凡六经子史百家，无不遍阅，一目悉记”，“喜接文儒士夫”，雅好吟咏，每逢花辰灯夕，延至士夫，命酒赋诗，相互唱和，创侍从儒臣之馆；“易隙地一区”，建正学书院；又于王府西建小学，教育王府护卫子弟^[1]卷一《宗室一·秦王传》。秦定王惟焯，正德四年（1509）封，“循理乐善，稽古右文”，“关中故无《史记》，王求善本刊之成趣轩中，俾学士家便观焉。”“侍卫子弟，遴其俊秀者，乃设学陶育之。”^[1]卷一《宗室一·秦王传》晋端王如烺，“好文雅，尝校《汉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创有书院^[1]卷一《宗室一·晋王传》。鲁府巨野王府镇国将军观焜，“被服儒素，雅好著述”，所建书院赐名“承训”^[1]卷一《宗室一·鲁王传》。蜀成王让栩，“性静哲喜儒，不迳声伎，动循礼法”，创设义学^[1]卷一《宗室一·蜀王传》。周府镇平王府奉国将军安河，“旁通子史百家言”“以代狗马球博之娱”，而“养志无方，购图史，作园亭，延四方之游，日夕燕嬉以快！”^[1]卷一《宗室一·周王传》唐成王弥鐸，“笃行博学，工诗绘而善敦睦”，弘治二年嗣爵，“广置精庐于国中，集学徒俊秀者资给之使肄业”^[1]卷二《宗室二·唐王传》。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堦，成化七年（1471）封，“博通群经，尤嗜绘事，法书名画未尝一日去手”，弘治二年，营御书楼、玩易洞^[1]卷二《宗室二·唐王传》，等等。总之，读书、著述，热心文化教育，并修建文化教育设施，成为了不少宗室

舒缓“藩禁”压力、规避政治风险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另外，宁王宸濠创建阳春书院则出于图谋不轨的动机。宸濠阴蓄异志，不法术士李自然、李日芳等言，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宸濠迷信其说，遂建阳春书院，“特出游以当之”^[2]卷一百七十五，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并不是为了发展教育，只是相当于宸濠沐浴天子之气的行宫。宸濠捐百金助修白鹿书院也是沽名钓誉之举，其目的是为了博得舆论的好感^[2]卷三十三，正德二年十二月壬午，为夺取明最高政权铺路。但这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三、宗室所建文化教育设施额名与明代宗室治理理念

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教育设施数量不小，文化设施 26 个，书院 41 座，书堂 7 所，小学 1 所，义学 1 所，共 74 座(所)。这还不包括宗室出资修建的学宫和购置的学田。其中，皇帝赐名的书楼、书院、书室、书斋、书舍、书堂达 66 座(所)，现列表如下(见表 6)。

这些额名按涵义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务学、宝文、博文、逊学、勉学、好古、崇文、修业、宝籍、传文、学文、守文、博观等。其中，博文赐名 3 次，逊学赐名 2 次，勉学赐名 6 次，崇文赐名 2 次，其他皆为 1 次。在这些赐名中，后一字为“学”的赐名有 9 个，后一字为“文”的赐名 6 个，后一字为“古”“业”“籍”“观”的赐名各 1 个。这里的“学”为名词，即学问、知识；“文”，即文化，与“武”相对；“古”“业”“籍”“观”，虽含义各有不同，但皆不出文化、学问的范围。二是谦勤、养德、尚贤、养正、养性、进德、正心、乐善、居善、崇本、处善、孝义、宝善、纯心、崇德、景贤等。其中，养德赐名 2 次，养正 2 次，乐善 4 次，崇本 2 次，崇德 2 次，其他各一次。后一字为“德”的赐名 5 个，后一字为“善”的赐名 7 个。“德”即道德、品行；“本”即根本，可引伸为孝亲；“善”即符合德性的事情；其他“心”“正”“义”“贤”，皆不出道德的范围。三是荣恩、遵道、崇礼、遵训、崇训、思训、循理、弘训、承训、遵教、好礼等。其中，遵道赐名 2 次，遵训 3 次，循理 2 次，其他各 1 次。后一字为“训”字的赐名达 7 个，仅次于尾字为“学”的赐名。还有阳春、励志、赏赐、味道的赐名。明代对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赐名是慎重的。以书院为例，凡请名者，礼部先予核实，“不许假借虚名以滋欺罔”。核实准确后，方得“题覆请给”。书院额名“俱取自上裁”，由皇帝钦定^[10]卷十六《奏讨书院书籍》。如此程序繁复，所赐额名应具有某种“深意”，包含了对宗室的希冀和塑造目标的表达。从上面三类赐名的涵义看，很显然，第一类赐名的寓意就是希望宗室博极群书，潜心问学；第二类赐名就是要宗室景仰先贤，修身养性，完善道德人格，提高道德水平；第三类赐名要求宗室循礼守法，感激皇恩，尊崇祖训，尽守藩之职，上卫国家，下安百姓。综观三类赐名，不难看出，要求既要宗室学问博洽、道德完善，又要遵礼守法。实际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三者是一体的，读书以养成德性，遵德性而守礼法，集中表达了对宗室治理的“儒生化”的目标。

文化教育是任何社会、任何一个阶层都需要的，只是其方式可能略有不同而已。宗室在明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满足和适应其文化教育的需要，明政府注重对宗室文化教育设施的建设。如早在洪武元年，即建大本堂，聚集古今图书于其中，延请名儒教授诸子，选取才俊之士充任伴读^[11]卷十四《东宫出阁》。洪武三年，分封制实行，亲王之国前，有出阁讲读之制，书堂设在皇极门右门，“讲官以部臣或进士改翰林官充之。”^[8]卷五十二《礼部十》东宫出阁讲学仪。隆庆三年，设置王府宗学，其主体建筑有仿照儒学而建的“先师殿、从祀廊庑及櫺、戟二门”，以祭拜至圣先师孔子及其他诸圣先贤；同时，尚建有祖训堂三间，尊藏《皇明祖训》及朝廷颁布的宗室管理法规《宗藩条例》《宗藩要例》；明伦堂三间，“以肃师生瞻仰”，为宗学教学之所；明伦堂两侧，东边建有经籍所，藏有经史等类书籍，供宗学师生使用；西边建有资贍所，为宗学师生提供后勤服务；在明伦堂、经籍所、资贍所的背后，复“各建号房数连，每连或五间，或十间”，以供宗生住宿^[12]卷七《宗学》^[5]卷五十，万历四年五月壬寅。基础设施完备，规模较为宏大。还有王府书楼由工部建造的例子，万历四十年四月，工部奏：福王在封地洛阳的府第告竣，“乞赐钦定书楼、牌坊额名”^[5]卷 494，万历四十年四月戊辰。此时，福王尚未之国，工部在为其建造府第时，即修建

了书楼,等等。

表 6 明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额名一览表

序号	宗室建文化教育设施	所赐额名	时间
1	代府镇国将军仕垓书室	务学	弘治八年
2	辽府湘阴王豪礪书堂	谦勤	弘治十年
3	襄王佑材书楼	宝文	弘治十五年
4	辽府光泽王宠怀书堂	博文	弘治十六年
5	晋王知烺书院	养德	弘治十七年
6	沈府沁水王长子勋瀛书院	逊学	弘治十七年
7	晋府庆成王奇滨书院	尚贤	弘治十七年
8	沈府相阳王子勋洙书院	勉学	弘治十八年
9	沈府西阳王诠钰收斋	好古	弘治十八年
10	唐王书院	养正	弘治十八年
11	韩府襄陵王书楼	荣恩	弘治十八年
12	西河王书院	勉学	正德元年
13	隰川王聪羨书院	崇礼	正德元年
14	灵川王书院	养性	正德元年
15	怀仁王书院	遵道	正德二年
16	山阴王成整书院	进德	正德二年
17	楚王书院	正心	正德三年
18	韩王书舍	崇文	正德七年
19	衡阳王书堂	遵教	正德十年
20	宁王宸濠书院	阳春	正德十一年
21	永和王知燠书院	乐善	嘉靖二年
22	宣宁王府奉国将军听濠等书楼	勉学	嘉靖三年
23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勋沅书院	养德	嘉靖三年
24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成燭书楼	博观	嘉靖三年
25	鲁府东廂五当泚书堂	励志	嘉靖四年
26	汝王祐楹书楼	崇本	嘉靖六年
27	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溇等书楼、书堂	处善孝义	嘉靖六年
28	鲁府辅国将军当灞书院	养正	嘉靖七年
29	鲁府巨野王王府镇国中尉观焜书院	承训	嘉靖八年
30	楚王荣濂书楼	崇本	嘉靖十八年
31	唐王宇温书堂	居善	嘉靖十八年
32	晋王新新塼书院	宝善	嘉靖十九年
33	宁河王奇法书院	明教	嘉靖三十一年
34	楚王英燠书院	纯心	嘉靖三十一年
35	淮王厚寿书楼	赏赐	嘉靖三十四年
36	交城王表佃书院	好礼	嘉靖三十七年
37	沈王恬燠书堂	修业	嘉靖三十八年
38	岷王定燠书院	乐善	嘉靖四十三年
39	赵府管理府事成皋王载琬书院	遵道	嘉靖四十四年
40	吉王翊镇书院	崇德	嘉靖四十五年
41	广济王定燠书院	遵训	隆庆三年
42	韩王朗铸书楼	宝籍	隆庆四年
43	郑王厚烷书楼	尊训	隆庆五年
44	河西王表相书楼	崇训	隆庆五年
45	华阳王承燠书院	乐善	万历元年
46	阳夏王载堃书楼	遵训	万历二年
47	德平王载堃书楼	传文	万历二年
48	肃王缙燠书阁	遵训	万历五年
49	山阴王俊柵书院	乐善	万历九年
50	高堂王厚煥书院	思训	万历九年
51	商河王工燠书楼	勉学	万历九年
52	乐安王多燠书院	博文	万历十一年
53	益王翊翎书院	逊学	万历十二年
54	郑王厚烷书院	景贤	万历十五年
55	上蔡王载堃书院	学文	万历二十二年
56	孟津王载堃书院	勉学	万历二十三年
57	晋王敏淳书院	宝善	万历二十三年
58	东垣王府翊铠书院	循理	万历二十七年
59	乐昌王廷儒书院、书楼	弘训	万历二十八年
60	繁昌王厚燠书院	味道	万历三十一年
61	庐江王厚光书院	循理	万历三十一年
62	建德王翊鉉书院	守文	万历三十二年
63	楚王叶奎书院	崇德	万历三十六年
64	惠府书楼	博文	天启七年

那么,明政府为什么还要允许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并如此赐名呢?这与明代的宗室管理政

策的演变是相符合的。“亲亲”与“防闲”是明代宗室治理面临的一对矛盾,解决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宗室社会的安宁。洪武之世,朱元璋信任诸藩,不仅经济待遇优厚,而且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赋以统兵治政之权,诸王多拥重兵,驰骋疆场。对宗室的期待当然也是文武兼资,洪武八年,命秦、晋、楚、靖江王“出游中都讲武事”^[13]卷一〇一,洪武八年九月壬子。洪武十一年,谕敕秦相府官:“王府设官,本古之道,然古者惟以文章之士匡辅诸王。朕封诸子兼设武臣于相府者,盖欲藩屏国家,御侮防患,无事则助王之治。所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13]卷一百一十九,洪武十一年秋七月戊子。靖难之役后,朱棣渐收诸王之权,对宗室的治理政策出现重大转折。至宣德以后,“藩禁”趋严,宗藩不得预兵事逐渐成为一项制度。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发生,明政权遭遇严重危机。宁化王洛焕欲率诸子从军,报效国家,诏不许^[14];襄陵王炆欲赴京勤王,亦被禁。成化六年(1470),鞑靼侵入河套,襄陵王炆再次请求率领子婿从军,宪宗严令不许。“自是宗臣无预兵事者”^[10]卷一一八。不仅如此,在宣德以后,宗室出仕之令也废:“当时大臣倡为疏忌宗室之说,遂废出仕之令。”^[7]卷一八六并不许“习四民业”^[15]。相应地,对宗室文武兼资的要求也逐渐变为了专重“德行”。宣德元年(1426),宣宗闻代王桂诸孙失学,贻书代王,“令王府官属教习读书以成德性”,讲习武事已经淡化^[16]卷二十二,宣德元年冬十月乙亥。弘治年间,钟陵王觐惟自陈骁勇善骑射,熟于韬略,愿备将帅,以身报国,兵部尚书马文升上奏说:“弓马骑射非宗藩所宜,幸自爱,读书近儒生。”^[14]代表了朝廷的观点,宗室治理的政治话语体系已与明初迥异。可见,至迟到弘治时期,明政府对宗室的要求不再是文武兼备,而是养成德性,娴熟书史、歌咏。明代皇帝在其赐名宗室所建文化教育设施中的表达,是其宗室治理理念的真诚流露,也是对宗室的谆谆告诫和教导,与宗室社会治理政策的转变存在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 [1] 焦竑. 国朝献征录[M]//吴湘湘,主编. 中国史学丛书. 台北:学生书局,1984.
- [2] 武宗实录[M]. 北京:线装书局,2005.
- [3] 清史稿·食货志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4] 世宗实录[M]. 北京:线装书局,2005.
- [5] 神宗实录[M]. 北京:线装书局,2005.
- [6] 孝宗实录[M]. 北京:线装书局,2005.
- [7] 徐孚远,宋征璧,陈子龙. 皇明经世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 申时行,等修. 明会典[M]. 北京:中华书局(万历朝重修本),1989.
- [9] 张廷玉.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 礼部志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7.
- [11] 郭正域. 皇明典礼志[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12] 王国典礼[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13] 太祖实录[M]. 北京:线装书局,2005.
- [14] 查继佐. 罪惟录:卷4[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15]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4[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6] 宣宗实录[M]. 北京:线装书局,2005.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